

怎样领导农村大辩论

农友编写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314.6

973

基藏本

存

怎样领导农村大辩论

农友编写

封面设计：张文瑞

*

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饵胡同78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81号

民族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发行

*

总号1801 开本787×1092¹/₃₂

印张7/8 字数18,000

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4,000

统一书号：T 3008·79

定价：(5)七分

目 录

为什么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.....	2
干部要解除五方面的顾虑.....	7
怎样鼓励群众“大放大鸣”.....	11
大辩论中应明确的几个原则.....	14
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.....	20
做好整社工作，把生产推向高潮.....	24

为什么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

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，中共中央发布了“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”的指示，指出这一教育是“关系到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”。

有人说，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改变，农民的个体生产已经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了；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已经由社会主义的胜利告终。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对全体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，是关系到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呢？

应该肯定：在党的领导下，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，我国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，使过去由个体农民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村，变成了集体生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；使五亿多农民摆脱了少数人发财、多数人贫困的资本主义道路，走上了共同发展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。这一改变，是党的政策在农村的伟大胜利。

但是，这一胜利，仅仅是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。因为社会主义改造，是包括两个方面的。一个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，也就是在经济上的生产关系的改造；另一方面，是人的思想改造。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。但是，人的政治思想改造却相差得很远。这是因为：生产关系的改造，并不能把人们的思想一下改变过来。毛主席在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”一书的按语中说：“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

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，它就必須清除这个基地。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，总是长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脑里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。”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，是从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农业社社員还是不久前的个体农民。同时，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，固然大多数不是社里的成員，但他們也是以被改造的身份在社里参加生产的。應該肯定：經過党的教育和合作社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，貧农和下中农社員，已經由要求办社变成合作社的坚强維護者了，任何破坏合作社的行为，都会遭到他們的反对。富裕中农也有很大一部分对合作社、对社会主义基本拥护。地主、富农、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，經過几年的改造，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但是，由于“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脑里”，不少社員并没有成为集体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者，如果碰到一些与他們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，遇到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造謠生事的时候，一些不坚定的社員就会发生动摇。特别是富裕中农，还容易和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一起，抗拒国家的各种政策。一些坚持反动立場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，更是在等待时机反对合作化，反对統購統銷，挑撥工农关系，扰乱社会秩序。这种情况充分說明了：人的改造，还差得很远，如果放松或中止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和思想教育，忽視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抬起头来。农村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事实，正是这样：

第一，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以前，资产階級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間，农村里也吹起了一股歪风。坚持反动立場的

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，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欢迎极了。他們認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，正是推翻党的领导、推翻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，因而积极地配合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动，在农村猖狂活动起来，向农村的党組織、农业社和农民进行反扑。他們利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点，利用党在农村宣傳貫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、調整农业社内部关系、扩大社内民主生活等机会，大肆活动，企图推翻党的领导，搞垮农业社。在他們的罪恶活动中，最突出的也是最露骨的就是反攻倒算。例如，广东省海康县的統計，就証明了这一点。这个县到七月二十二日止，进行造謠破坏、反攻倒算的地主富农共有四百一十八戶，其中向农民索取房屋的一百三十七件，索取土地的有二十件，造謠破坏、拉拢农民退社的有一百多件，篡夺农业社领导权的有二十三件。更严重的是，有些坚持反动立場的原地主、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，竟然聚众械斗，毆打干部，破坏生产。河南商城县郭窑乡不法地主就把社长打了一頓。北京市丰台区黃土崗乡不法地主分子刘德璞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持刀砍伤农妇李洪珍，并且企图杀死社干部霍斌。这种反动气焰，真可說是猖狂已极。如果不把这种反动气焰打垮，怎能在农村建設社会主义？同时，这些具体事实也足以說明，生产关系的改造虽然已經基本完成，农村里的階級斗争并没有結束；相反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，階級斗争还很激烈。

第二，在右派分子和不法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影响下，部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，并且正在发展。他們留恋个体經濟，对合作化和統購統銷心怀不滿，說

什麼統購統銷搞糟了，農民吃不飽；說合作化不优越，入社不自由，不如單干好；說農民生活沒有提高，甚至還不如舊社會，等等。因而，他們在糧食分配上要求先私後公，或是多分、分光，要求不賣或少賣余糧，完全不顧集體利益和國家需要；在社的管理上主張只講民主，不要集中；有的還串連、拉攏別人退社單干；有的放高利貸或作投機生意。這種情況同樣說明，單單只是所有制的改變，而人們頭腦中的資本主義思想未被克服，社會主義改造是沒有完成的。也就是說，只有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，沒有政治上、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，那是十分不夠的，而且是十分不巩固的。

第三，大多數農村黨員和幹部，是忠實地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，他們是廣大農民所擁護的領導者。可是，有一些農村黨員和幹部，沒能認清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形勢，沒能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的原則。他們在部分不法地主、富農分子和殘余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、富裕中農也呼喊得厲害起來時感到突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也有一些農村黨員和幹部，在對象糧食問題這樣同社會主義的命運有極密切關係的重大問題上，錯誤地站到了個人主義、本位主義的立場上，和農民中的落後分子一起隱瞞產量，不願按計劃將糧食賣給國家。有些同志，對於壞分子危害農村秩序、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，採取了放任的態度，沒能及時地給以有力的打擊。此外，還有些同志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綫划不清楚，他們強調了農村各種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方面（當然，這是正確的），但對敵我矛盾卻忽視了（這是不對的）。因此，他們就錯誤地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性質，以致把許多敵我矛盾也當

成人民内部矛盾了。这种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辨别是非、分清敌我的想法和作法，充分说明了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。

以上三个方面的事实，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前农村中所反映的情况。这些情况充分说明：尽管合作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但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斗争仍然很激烈，而且这种斗争也不是一年两年所能解决的问题。同时，这种情况也告诉我们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影响。如果不及时地不断地在农村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，提高农民群众觉悟，揭穿地主、富农及其他坏分子的造谣破坏，并给予有力的打击，我们就决不能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。对于富裕中农，我们的政策当然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团结他们的。但是，对那些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，如果不跟他们展开说理斗争，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，使正气伸张，就达不到团结他们的目的。至于农村党员和干部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领导人。他们的思想如果不健康，右倾情绪得不到批判，就不能轻装上阵，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就领导不好。只有批判了党员干部中的右倾思想，才能保证这个革命的顺利进行。

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，就是要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、本位主义，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，提高农民和干部的思想觉悟，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、富农及其他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。这就是农村中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。没有这场斗争，社会主义就不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取得胜利。因此，它是关系

到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辯論，而且这一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，不是进行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，而是每年应该进行一次。

既然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样重要，农村干部就应该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，一方面积极克服某些错误认识，提高觉悟，改进工作作风；另一方面，积极研究和学习政策，领导全体农民，把大辯論开展起来。

干部要解除五方面的顾虑

我们的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，对党的事业、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。但是，由于领导农民大辯論，对许多县、区、乡、社干部来说，还是一件相当生疏的工作，因而有些人觉得没有把握，有些人还有不少顾虑。为了保证这场大辯論热烈而不紊乱，深刻而不拖延，首先要消除这些同志的顾虑，增长这些同志的信心，使他们准备妥当，轻装上阵。

农村干部对于领导农民进行大辯論有些什么顾虑呢？根据各地的情况来看，大致有以下这些：

第一，有人说：“农民这样辯論起来，搞乱了怎么办呢？”说这样的话的人，本心是好的，但他们认为辯論起来会把事情搞乱了，则是不对的。因为在农村进行大辯論，离不开几个根本问题：农民生活上升了还是下降了？合作化运动好不好？统购统销对不对？对这几个问题，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：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改善了；合作化运动是健康的，当中虽有缺点，但是局部的、暂时的；统购统销保障了国家需要和人民吃用，对农

民只有好处沒有坏处。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的偉大成績，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农和下中农，都在土地改革、合作化运动和大生产中翻了身，从根本上說，他們都是坚决地拥护党的方針政策。他們对某些政策和某些工作部署也有意見，但他們提意見不是为了反对党的政策，而是为了帮助我們糾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，为了帮助我們把农村工作做得更好。富裕中农中間，一部分是拥护党的政策的；也有一部分跟着地主、富农抗拒和反对党的政策，但他們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，而且他們的市場，越来越小了。党的方針政策牢牢地掌握了农村人口的絕大多數，在辯論这些政策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耽心搞乱了呢？因此，怕辯論起来搞乱了的想法，是沒有根据的，也是不对的。

第二，有人認為：大辯論的最初阶段，會出現反面意見暂时占上风的現象，怕这样下去，反面意見始終占上风，将来不好解决各种問題。其实，这种顧慮也是多余的。即使在辯論的最初阶段，反面意見暂时占上风，也不必害怕。根据各地經驗証明：群众給領導提意見时，最初难免較少的看到成績，較多的看到缺点，反面意見容易集中起来。但是，农民群众都生活在光明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他們亲身感受的活生生的事实，决不是一些反面意見所能掩盖了的。我們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，引导他們深入地全面地辯論下去，把解放前后、土地改革前后和合作化前后的生活加以回忆、对比，那末，事实就会站到人們面前，帮助大家分清是非，說服反面意見。同时，还应该看到，反面意見固然不好，但它也有好的一面。因为这种意見是活教材，它从反面教育人們不應該怎样想，不应

該怎样做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該因为怕反面意見占上风，就在反面意見露头的时候，一棒子打回去。相反的，却應該允許提反面意見，并在有了反面意見以后，很好地把反面意見利用起来，用反面意見当教材，然后通过說理的办法，批判反面的意見，从而說服那些認識模糊、处于中間状态的农民。許多地方的經驗証明：只要善于說明道理，让反面意見都提出来，其結果对辯論不但沒有坏处，还有很多好处。因此，怕反面意見占上风的顧慮，也不必要。

第三，也有一些同志怕在大辯論的过程中，地主、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謠、搗乱、破坏，因而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展开辯論。其实，这种顧慮也沒有必要。因为坚持反动立場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，早晚是要进行破坏活动的。在沒有展开大辯論的时候，他們就窺伺空隙，待机而动。現在遇到大鳴大放的机会，自然会鑽出洞来，千方百計把事情搞乱。这些家伙是凶狠的，但数量是不多的，力量是不大的，因而也就沒有什么可怕。只要我們随时加以提防和警惕，并依靠基本群众，团结中間群众，对坏分子及时加以揭露、駁斥和打击，他們是沒有力量造反的。同时，我們也应看到，这些家伙就象人身上的膿疱一样，不挤出来，早晚也要鬧事。趁大辯論的机会，把他們挤出来，让他們早現原形，我們早动手剷除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还顧慮呢？

第四，还有一些同志，顧慮这样辯論起来以后，今后的事情难办了。这种看法也是沒有根据的。也許，这些同志所說的“事情难办”，就是农民不“听話”，工作不順手的意思。对这种意思，得分析分析：农民为什么不“听話”？可能有两种原因。

一种是干部的“話”本来不对，农民当然不愿意听从。一种是“話”虽然对，但农民还没認識到它对，所以不想听从。过去有些人采取命令的办法，硬要农民听自己的“話”；事情虽然办了，但人家心里不服。这些同志发现旧办法不行了，又没有学会新办法，所以对群众性的大辯論就发生了这样的顧虑。其实，我們发动农民大辯論，正是让农民“听話”的一种好办法。在辯論的过程中，农民把意見都說出来，对干部的“話”（意見、工作安排和部署）进行一次严格的考驗。如果我們的“話”是錯的，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見，及时加以修正。只要我們的“話”对头了，农民自然就会听了。如果我們的“話”原是对的，只是因为农民理解錯了，所以不愿接受，这也没有什么。我們发现了农民認識的偏差和思想“疙瘩”，才可能对症下葯，說服、开导。只要打通了思想，提高了認識，农民自然会听我們的“話”。这样，事情不是难办了，而是好办了。因此，决不要害怕今后工作难办而阻止农民发表意見。我們应当启发、动员农民把心里話都講出来，然后同他們一起辯論、分析。至于中途阻止別人发言、随意給別人扣帽子的作法，更是不对的，應該坚决防止，力求让农民作到暢所欲言，充分講理。为此，領導辯論的同志們就要在辯論会上充分發揮民主，使会上形成一种民主气氛。

第五，有些地方有些同志还有另一种顧虑，那就是他們怕在大放大鳴中意見提到他們头上，怕从此在群众中失去威信。这种顧虑是对批評、提意見的誤解。其实，批評是我們前进的武器，批評對我們革命干部來說，好象人离开空气和水不能生活一样。一个革命干部如果离开了批評和自我批評，就不能前

进，就不能把工作作好。我們許多同志知道这个道理，因而經常征求別人对自己的意見，希望別人对自己提出批評。現在，我們发动群众大辯論，让他們給領導提意見，同时也可能提到自己头上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这不正是革命干部所希求的嗎？因此，我們不應該怕农民把意見提到自己头上，而應該欢迎他們多提意見。至于农民可能提出一些偏激、过火的意見，也沒有什么可怕，这种意見也不会給我們造成任何損失；相反的，它还会使我們对自己的錯誤、缺点引起更大的警惕。因此，我們應該耐心地把全部意見听完，加以集中、整理、分析。对的，誠懇地接受和改正；不对的，利用适当时机加以說明、解釋。只要把道理說清楚，农民的偏激情緒自然就消失了。

以上五方面的顧慮，是农村干部領導大辯論中的主要顧慮。除了这些顧慮以外，也还有一些其他的顧慮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但是，應該說明的是，不管任何顧慮都是不对的，都應該解除。原因是這場大辯論，是党領導的，是发动群众来辨明是非的，是在我們的正义事业已經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只要我們相信党、相信群众、相信我們的事业的正义性，就沒有什么值得顧慮的。

怎样鼓励群众“大放大鳴”

在农村中展开大辯論，所采用的办法是“大放大鳴”和“大爭”。“大放大鳴”是“大爭”的依据；“大爭”是为了解决“鳴放”

出來的問題。只有“大放大鳴”，才能把一切問題“亮”出來，也才有東西託人們“大爭”。只有進行“大爭”，才能分清是非，講通道理，教育群眾，打擊敵人，提高幹部，改進工作。因此，“大放大鳴”和“大爭”，是一個工作的兩個階段，而“大放大鳴”，又是“大爭”的基礎。“放”的越徹底，“爭”的越有勁兒，解決問題就會越圓滿，運動發展得也會越順利。如果“放”得不徹底，或者中途要被迫“補課”，會延誤很多時間；或者會降低辯論的效果，不能圓滿地完成對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任務。所以，想盡一切辦法，鼓勵群眾“大放大鳴”，是領導大辯論時應該首先作好的工作。

領導群眾“大放大鳴”，除了幹部應該解除各種顧慮以外，就是要着重解除群眾的顧慮。用大辯論的方式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，對我們的幹部來說，是比較生疏的工作。對群眾來說，也是一件新鮮事兒。在這個新工作面前，我們幹部有顧慮，群眾當然也有顧慮。幹部有顧慮不解除，就不能領導群眾“鳴放”，群眾有顧慮不解除，就不會“鳴放”起來。這是許多地方已經證明了的。因此，領導農村大辯論的農村幹部，除了把自己的各種顧慮解除以外，就要想辦法解除群眾的顧慮。

那末，群眾對“大放大鳴”有些什麼顧慮呢？根據各地的情況看來，群眾的顧慮雖然是多種多樣的，但總起來說不外乎兩個。一個是怕提了意見不管事，不知道提錯意見會不會被戴上大“帽子”。另一個是不明白大辯論的性質，怕象鬥爭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那樣鬥爭有錯誤思想的人。

為了解除這兩個顧慮，必須從兩方面進行工作。

第一，在“大放大鳴”以前，要運用小型座談、小組漫談和

个别串連等方式，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討論，耐心地向群众講清楚大辯論的性質及其要解决的問題。这就需要首先向群众說明白：举行群众性的大鳴大放辯論，是为了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覺悟，改进村里和社里的工作。在这同时，乡、社領導干部，就应该表示坚决的态度，說明改进工作的决心，让群众知道大家提的意見，能办的馬上就办，不能馬上办的也要向大家說明情况，有了条件再办。这样，就能坚定群众的信心。其次，应该向群众說明：群众性的大辯論和斗争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是两回事。告訴群众，在社員中“大放大鳴大爭”，是为了充分发揚民主，依靠大家的力量分清全国、全省的大是大非問題，和乡里、社里的小是小非問題，克服人們思想中的資本主义傾向，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农业社。因此，在这样的辯論中，对正确的意見一定接受；对錯誤的意見只进行說理辯論，一律不戴右派“帽子”；給干部提各种意見，一律不得打击报复。干部也应该在适当的机会，对群众表示这样的态度。如果我們能够把以上的道理都說明白，干部又能以身作則，按政策办事，农民就会解除顧慮，逐步“大放大鳴”了。

第二，在宣傳動員过程中以及在“大放大鳴”起来以后，一定要坚持“边整边改”的原則。这就是說，要說到作到，以提高农民的積極性，巩固农民要求解决问题、改进工作的信心。前边說过，农民对“大放大鳴”的重要顧慮之一，就是怕說了不算，怕說了不頂事。如果我們能够坚持“边整边改”的原則，在宣傳動員和“大放大鳴”过程中，对一些正确的、又馬上能照办的意見接受下来，并切实改正，农民就可以完全信賴这一运动能够解决问题，因而也就必然解除顧慮，把意見都提出来。

要作到“边整边改”，首先应该从干部作起。許多地方証明，由于乡社干部是农民的直接领导者，农民在給领导提意見时，总是先把对直接领导者的意見提出来。如果农村的基层干部作风上有缺点或錯誤，能够主动的檢討，認真的改正，就会坚定农民的信心。其次就是要对社里的突出問題进行及时的研究，及时的改正。我們在向农民讲解“鳴放”的政策时，既然向农民保証过能办的馬上就办，那末，当群众提出社里最突出的問題来，要求改进，我們就应该实践自己的諾言，取得群众的信任。特別是在“三类社”中，更加应该这样作。因为在“三类社”中問題比較多，这种类型的合作社中的社員，特別缺乏改进工作的信心。如果能够在这种社中作到“边整边改”，把这类社的社員都发动起来“大放大鳴大爭”，对整个大辯論更有推动作用。

以上两方面的工作，是解除群众顧虑的重要环节。要把这两項工作作好，关键問題还在于干部。因为工作是要干部作的，缺点和錯誤是要干部改的。同时，农村基层干部，也要痛下决心，改善工作方法，提高工作能力，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，以便和群众一起，使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地提高一步。

大辯論中应明确的几个原則

前面說过，“大放大鳴”是为了“大爭”。就是以“大放大鳴”中摆出来的事实作根据，在群众中展开爭論，辨明是非。

“大放大鳴”是擺問題。只要我們大胆放手，解除群眾顧慮，鼓勵群眾“鳴放”，就可以把問題都擺出來。至于“大爭”，是要根據事實講道理的，是大辯論中的中心環節。這樣的工作，比起“鳴放”來，就要細致和複雜得多。因此，在“大爭”中，也就是在真正辯論的時候，就要進行細致的工作，強調辯論得透，理講得深，防止簡單和粗暴。

要想辯論得透，理講得深，防止簡單和粗暴，必須明確以下幾個原則：

第一，必須劃清各種問題的政策界綫。大辯論對農村幹部和農民是一次社會主義的自我教育，對不法地主、富農及反革命分子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。這就可見，大辯論中要解決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。要想在這樣複雜的情況下明辨是非，就必須劃清各種問題的政策界綫，對各種性質不同的問題分別對待。這就需要首先分清善意的批評、落后的言論和反社會主義謬論這三種性質不同的問題，然後用不同的態度去對待。

善意的批評是多數農民所持的態度。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農民，他們擁護合作化制度，擁護統購統銷政策。他們為了鞏固合作化制度，使統購統銷政策執行得更好，因而對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不滿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。這樣的批評，就是善意的批評。即使這樣的批評難免有些過火的地方，但其用心是好的。對待這樣的善意的批評，應該採取一律歡迎的態度。他們批評得對的，應該接受下來，堅決改正；對於批評得不對的，應該在適當的時機加以必要的解釋。總之，要使這樣的批評件件有下文，條條有交代。

勞動人民當中也有一部分落后的人，他們懷疑、抗拒黨的